

# 鲁迅言论摘编

10.2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毛主席语录

鲁迅的两句诗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。“千夫”在这里就是说敌人，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。“孺子”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。一切共产党员，一切革命家，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，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“牛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

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---

## 目 录

- 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..... ( 1 )
- 揭露资产阶级两面派 ..... ( 16 )
- 批判投降主义 ..... ( 28 )
- 批判孔孟之道 ..... ( 41 )
- 反对调和、折中 ..... ( 54 )
- 支持新生事物 ..... ( 61 )
- 坚持革新、反对复辟倒退..... ( 73 )
- 坚持彻底革命 ..... ( 92 )
-

## 论阶级和阶级斗争

……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！

◀南腔北调集·祝中俄文学之交>(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)

……开了风扇，吃着冰淇淋，不但和“水位大涨”“旱象已成”之处毫不相干，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，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，也完全是两个世界。

◀花边文学·知了世界>(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)

……“物质文明”也至少有两种：一种是吃肥甘，穿轻暖，住洋房的；一种却是吃树皮，穿破布，住草棚，——吃其所不当吃，穿其所不当穿，而且住其所不当住。

◀集外集拾遗·两种“黄帝子孙”>(一九三五年)

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，实际上的不同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。这一世界中人，会轻蔑，憎恶，压迫，恐怖，杀戮（lù）别一世界中人，然而他不知道，因此他也写不出，于是他自称“第三种人”，他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……不要骗人罢！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？

◀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<丰收>序>(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)

……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，不是奴隶，就是敌人，决不能成为朋友，所以彼此的道德，并不相同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后记》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）

帝国主义和我们，除了它的奴才之外，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？我们的痼疽（yōngjū 拥菊），是它们的宝贝，那么，它们的敌人，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们不再受骗了》（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）

据我自己想：只要是地位，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，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，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内山完造作〈活中国的姿态〉序》（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）

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，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人，对于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给我十刀，我只还他一箭。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。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，我在广东，就目睹了同是青年，而分成两大阵营，或则投书告密，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！我的思路因此轰毁，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，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。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，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。

《三闲集·序言》（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）

某一种人，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。说起来，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，然而事实是如此的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谚语》(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)

自然，“喜怒哀乐，人之情也”，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，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，饥区的灾民，大约总不去种兰花，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，贾府上的焦大，也不爱林妹妹的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(一九三〇年)

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“清福”。不过要享这“清福”，首先就须有工夫，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，我想，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，在喉干欲裂的时候，那么，即使给他龙井芽茶，珠兰窨(xūn熏)片，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。所谓“秋思”，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骚人墨客，会觉得什么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，风雨阴晴，都给他一种刺戟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“清福”，但在老农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，就要割稻而已。

《准风月谈·喝茶》(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)

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，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，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〈争自由的波浪〉小引》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)

先前，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，近来才知道无须。在“新时代”里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。

《而已集·新时代的放债法》

(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)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

《坟·灯下漫笔》(一九二五年

四月二十九日)

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，世界上穷人有份的，只有日光空气和水。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，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，他就晒不着日光，吸不到好空气，装不起自来水的，也喝不到干净水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靠天吃饭”》(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)

有些慷慨家说，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。此说其实是不确的，穷人在实际上，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。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，也会无端被“踢”，送掉性命的：落浦。要救朋友，或拉住凶手罢，“也被用手一推”：也落浦。

《准风月谈·踢》(一九三三年

八月十日)

我在中国，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“文化”；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，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，还有电气机械，以拷问革命者，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



命群众。

◀且介亭杂文·答国际文学社  
问>(一九三四年)

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，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。上海有电刑，一上，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，少顷又醒，则又受刑。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，即幸而免死，亦从此牙齿皆摇动，神经亦变钝，不能复原。前年纪念爱迪生，许多人赞颂电报、电话之有利于人，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，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，福人用电气疗病，美容，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，丧命也。

◀伪自由书·电的利弊>(一九  
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)

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，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？这无须多议论，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。他们打得你死我活，好象不共戴天似的，但到后来，只要一个“下野”了，也就会客客气气的，然而对于革命者呢，即使没有打过仗，也决不肯放过一个。他们知道的很清楚。

◀伪自由书·“杀错了人”异  
议>(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)

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，或者凭官力，……压不下时，则于是呼捧，以为抬之使高，屭(yàn)之使足，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，得以安心。

◀华盖集·这个与那个>(一九  
二五年十二月十日)

斗争呢，我倒以为是对的。人被压迫了，为什么不斗争？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，于是大骂“偏激”之可恶，以为人人应该相爱，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。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，但饿人却不爱饱人，……

《三闲集·文艺与革命》（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）

近来的读书人，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，无法可想，将倒楣的责任，归之于大家。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。小民虽然不学，见事也许不明，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，何尝不会团结。先前有跪香，民变，造反，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。他们的象沙，是被统治者“治”成功的，用文言来说，就是“治绩”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沙》（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）

无论如何，总要改革才好。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，孙中山奔波一世，而中国还是如此者，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，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。

《两地书·一〇》（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）

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，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，露出那出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，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。

《华盖集续编·空谈》（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）

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，向来就并未放松过，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。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，总是吃亏，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，自此以后，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。

◀坟·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>(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)

墨写的谎说，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

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。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！

◀华盖集续编·无花的蔷薇之二>(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)

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，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；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

◀华盖集续编·纪念刘和珍君>(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)

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

◀华盖集续编·纪念刘和珍君>(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)

和朋友谈心，不必留心，但和敌人对面，却必须刻刻防备。我们和朋友在一起，可以脱掉衣服，但上阵要穿甲。

◀鲁迅书简(下)·致肖军、肖红>(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)

蒙蔽是不能长久的，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文坛上的鬼魅》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
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，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
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（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）

现在则已是大时代，动摇的时代，转换的时代，中国以外，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，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，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，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。

《三闲集·“醉眼”中的朦胧》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）

在我自己，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，都受“支配于经济”（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）之说，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。但是“都带”，而非“只有”。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，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，也不相信住洋房，喝咖啡，却道“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，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”的革命文学家。

《三闲集·文学的阶级性》（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）

文学有阶级性，在阶级社会中，文学家虽自以为“自

由”，自以为超了阶级，而无意识地，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，那些创作，并非别阶级的文化……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

……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，都有一个“自己”，这“自己”，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，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，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，在资产阶级如此，在无产阶级也如此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又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（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）

革命文学家，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，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。（最近左联的提出了“作家的无产阶级化”的口号，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。）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  
（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）

文学是战斗的！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  
《丰收序》》（一九三五年一月  
十六日）

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，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，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。繁难的象形字，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。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，便首先发出战叫。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，走狗的文人即群起

进攻，或者制造谣言，或者亲作侦探，然而都是暗做，都是匿名，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。

《二心集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(一九三一年)

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，带些战斗性的，那么，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八》(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——十九日)

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，除此以外，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。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“艺术家”，早已腐烂到连所谓“为艺术的艺术”以至“颓废”的作品也不能生产，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，只有诬蔑，压迫，囚禁和杀戮；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，也只有流氓，侦探，走狗，刽子手了。

《二心集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》(一九三一年)

……文人还是人，既然还是人，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，有爱憎；但又因为是文人，他的是非就愈分明，爱憎也愈热烈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再论“文人相轻”》(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)

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，其实是不能够的。假如出一

个“学而时习之”的试题，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，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。自然，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，是胡说，但这不通或胡说，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。

《淮风月谈·前记》（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）

俄国大改革之后，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。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，简直不象人间；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，后来一定有希望。或褒或贬，结论往往正相反。我想，这大概都是对的。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，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。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，说了一面的话。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，但在北京的报纸上，所见的却相反，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。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。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，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，也毫不足怪。俄皇的皮鞭和绞架，拷问和西伯利亚，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〈争自由的波浪〉小引》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）

浊浪在拍岸，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，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，惟有衣履尚整，徘徊海滨的人，一溅水花，便觉得有所沾湿，狼狈起来。

《三闲集·柔石作〈二月〉小引》  
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）

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“革命人”，倘是的，

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，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即都是“革命文学”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

《而已集·革命文学》(一九二七年)

……我所遵奉的，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，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，决不是皇上的圣旨，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〈自选集〉自序》  
(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)

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，旧性荡涤不尽，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(一九三〇年)

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，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要做这样的人，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，要离开地球一样，他离不开，焦躁着，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，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论“第三种人”》  
(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)

……梁先生的这篇文章<sup>①</sup>，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

---

① 指梁实秋的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



性，张扬真理的。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，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，只要一瞥，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“武器”，——不，“文章”了。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“全人类”“超阶级”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，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

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，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，又要挂革命的招牌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。身在现世，怎么离去？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，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。

《三闲集·文艺与革命》（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）

于是别一方面，就出现了所谓“第三种人”，是当然决非左翼，但又不是右翼，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。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，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，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，一相关，就失去它的永久性，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文坛上的鬼魅》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）

我想，普遍，永久，完全，这三件宝贝，自然是了不得的，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，会将他钉死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答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）